

林家遗址与马家窑文化

●王永安 康彤 周静



意大利返还中国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器。

新华社

11月8日,意大利返还的56件中国文物艺术品回归祖国,其中不乏多件马家窑文化彩陶。

2024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村发现了一处史前遗址,命名为“甘肃仰韶遗址”。1944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开启了西北考察之旅,随后将甘肃仰韶遗址重新命名为马家窑文化。自此,马家窑文化享誉国内外。

此次回归的彩陶让人们再次认识了马家窑文化的艺术价值。甘肃,有哪些与马家窑文化有关的遗址呢?为何要探寻马家窑文化遗址?追溯远古历史,礼赞悠久文明。经过几代考古学者的不懈努力和深入研究,人们对古老灿烂的马家窑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马家窑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百年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研究,有关马家窑文化的研究成果日趋丰硕。研究表明,马家窑文化距今5300年—4000年,以制作精美、黑红厚重、图案繁复多变的彩陶为显著特征,以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冠名史前彩陶艺术之巅峰的美称。其脱胎于仰韶文化,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早年间将马家窑文化称之为甘肃仰韶文化,并认为马家窑类型是继继庙底沟类型在西北地区的继承与发展,在西北广袤的地区独树一帜,素有“西北高地的早期开拓者”之称。马家窑文化分布广泛,以陇西黄土高原为中心,东至陇东黄土高原,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东北部,北达宁夏南部,南抵川北高原。其文化内涵丰富,可根据其文化特质和地域分布具体分为石岭下、马家窑、半山与马厂四个类型,四个类型各具特色,但又彼此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家窑文化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风格,为我们了解和探索远古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石岭下类型遗存主要分布于甘肃东部陇西、秦安、天水、武山一带,彩陶以泥质橙黄陶的罐、壶、瓶最为典型,纹饰图案多为旋纹、变体鸟纹、鱼纹、圆点、弧边三角、弧线组成的几何纹和动物纹。

马家窑类型遗存主要分布于兰州、临夏等境内的黄河沿岸地区,彩陶以泥质橙黄陶为主,常见器形有盆、瓶、壶、葫芦罐、瓮等,陶制细腻,彩绘为黑彩,纹饰图案主要有条带纹、圆点纹、漩涡纹、变体鸟纹、弧线三角纹等。

半山类型遗存主要分布于我省陕西河谷和盆地、河西走廊以及青海东北部地区,彩陶以红陶为主,常见器形有罐、瓶、壶,纹饰图案常见有黑红彩相间的条带纹、锯齿勾勒几何纹饰、象生性纹饰,如漩涡纹、网格纹、圆圈纹、菱形纹、锯齿纹。

马厂类型遗存分布与半山类型遗存大致重合,只不过西界更向西,已延伸至河西走廊、青

海地区,彩陶以红陶为主,常见器形有罐、瓶、壶、豆、双联罐等,较之半山类型器形更加瘦长,腹部内收明显,制作技术粗糙。纹饰图案主要以蛙纹、四大圈纹、三圈纹、折线三角纹为主,部分陶器表面存在紫红色陶衣。

目前,甘肃省经过正式发掘的马家窑文化遗址有临洮马家窑、兰州青岗岔、天水师赵村、武山傅家门、东乡林家、民乐五坝墓地、青海乐都柳湾、海原曹洼等。众多遗址的发现,不仅展现了马家窑文化独特的艺术风格,还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观念以及宗教信仰,通过这些遗址遗迹让我们得以窥见古人的智慧与创造力,为我们深入了解远古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在众多马家窑文化遗址中,林家遗址作为马家窑文化代表性遗址,在整个马家窑文化研究领域占据重要地位。林家遗址地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是一处典型的马家窑类型遗址。1977年—1978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等单位联合对林家遗址展开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发掘总面积3000平方米。清理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汉、唐代遗迹共计135处。其中马家窑文化房址27处、窑址3处、灰坑98处,从地层上厘清了林家遗址马家窑类型存在早、中、晚三期的堆积关系,此外出土了包含陶器、石、骨、铜等各类器物3000余件。其中石器多以板岩、花岗岩、鹅卵石为原材料,大部分石器通体磨光,表面光滑,使用痕迹明显,骨器则以动物的肢骨制成,常见有骨锥、骨针等,其中部分骨针保留穿孔,反映了当时人们高超的手工艺水平。

发现数量较多的陶器,陶色以泥质橙黄陶为主,表面饰以黑彩,造型独特。其中编号为F16:7的文物是一件彩陶盆。该件彩陶盆高37厘米、口径24.5厘米,腹部以上饰黑彩,敛口圆唇、折沿斜腹,双腹耳,肩及耳部以上,分层绘平行线纹、变体鸟纹、并列的弧线纹、圆点纹和弧线三角纹组合而成的纹饰,整体工艺精湛,纹饰精美,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

编号H55:34的文物是一件外附四个角状钮的四罐罐,造型独特,较为罕见。此件文物高31厘米、口径15厘米,敛口、斜肩、深鼓腹、双腹耳、平底,口沿外饰黑色宽带彩,器钮之间留有柳叶纹底色,肩部平行饰黑色宽带,细条纹,其下是由纵横交错的细条纹组成的网格状纹饰,腹部饰连弧并列的条带纹和爪状纹饰。

要特别说明的是遗物中还发现了1件青铜刀,该铜刀长12.5厘米,为两块范浇铸而成,刀身薄厚均匀,表面平整,并且存在镶嵌木柄的痕迹,经鉴定铜刀是由含锡的青铜冶炼而成,后被誉“中华第一刀”,另见铜渣若干,其意义重大。这件青铜刀的发现预示着当时人们已经从事铜器冶铸生产活动,同时为探索早期冶金技术传播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但由于发现实物材料较少,学界对于该时期是否进入铜石并用时代、马家窑时期是否存在冶金活动一直存在疑问。

此外,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炭化谷物大麻子、稷、粟,进一步揭示了5000年前后该地区人类活动的经济模式,即狩猎、畜牧与农业并存的复合型经济。

因此,为了更好地、全方位地解决马家窑文化未解之谜以及探索5000年前后西北地区的文明史,202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48年后重新启动对林家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本年度清理遗迹丰富,以灰坑为主,另发现少量房址、窖穴、道路、灶址、窑址等。其中房址以半地穴式为主,平面形状分为方形和圆形两种,保存较差。灰坑平面形状主要有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三类。此外窑址一处,破坏严重,仅剩火膛部分。

此次发掘出土遗物内涵丰富,按比例高低依次为陶器、石器与骨器。陶器以泥质橙黄陶和夹

砂灰陶为主,泥质橙黄陶多见黑彩,纹饰有条带纹、圆点纹、变体鸟纹、弧线三角纹、垂弧纹等。可辨器形有盆、钵、甑、罐、瓶、壶等,这其中以盆为大宗,其次为钵和罐。夹砂灰陶常见纹饰有附加堆纹、刻划纹、压印纹、戳印纹、交错绳纹等,可辨器形主要为罐。石器主要以砾石、鹅卵石、页岩为原材料,器形主要为石环、石刀与石凿等。另外本次发掘获取了大量的动、植物遗存标本,为进一步探索该地区马家窑文化时期产业模式与古环境复原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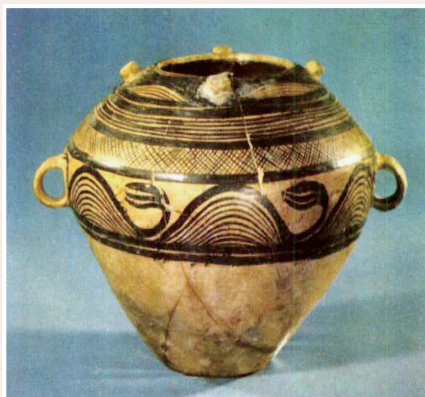
大夏河流域作为马家窑文化分布的核心地带,囿于考古学资料的匮乏,一直未受到学界的重点关注。此次林家遗址重新启动,以及围绕大夏河流域今后开展的一系列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对于全面探索马家窑文化,更全面地了解马家窑文化时期的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信息,深入揭示马家窑文化内涵、活化马家窑文化的社会意义,以及探索早期青铜冶炼及冶金起源问题和构建大夏河流域考古学文化序列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探索过去、连接未来,立足考古发现,不断探索中华文明的足迹,马家窑文化研究仍在持续中。

(作者单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转自《甘肃日报》)



马家窑类型彩陶瓮 林家遗址出土



马家窑类型彩陶四罐罐 林家遗址出土



马家窑类型彩陶盆(临夏州彩陶博物馆藏)



林家遗址考古发掘区

王竑不仅是明代前期著名的爱国民族英雄、军事家兼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由于王竑爱国事迹非常突出,人们对他作为一名爱国民族英雄了解比较多,印象深刻,但对其他方面,特别是对他作为政治家的事迹了解甚少。因此,本文专门对王竑政治事迹进行论述,以期人们对这位明代前期杰出的政治家有一个清楚认识。

王竑的政治活动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即明代宗在位时期;后期,即明英宗复辟后和明宪宗在位时期。前期,王竑政治活动轰轰烈烈,曾在土木堡事件后为挽救国家危亡,率众当廷打死为虎作伥、气焰嚣张的锦衣卫指挥马顺,并在随后的京城保卫战中协助民族英雄于谦取得了京城保卫战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京城保卫战胜利后又被朝廷委任为江淮巡抚,在疏通京杭大运河和救济百万灾民中政绩卓著。在后期,在蒙古鞑靼侵扰明朝北方,明军连吃败仗军情紧急的情况下,王竑“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被朝廷重新起用,官复原职,率军击败鞑靼侵扰,再建战功。之后再次被委任为江淮巡抚,最后升任兵部尚书。

作为政治家必须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有关政治活动。王竑前期的政治主张和有关政治活动,集中在反映在明景泰年间他给明代宗的两次奏疏中。这两次奏疏的内容(明史·王竑传)和《大明英宗睿皇帝实录》等众多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而《大明英宗睿皇帝实录》记载为最完整。现根据《大明英宗睿皇帝实录》记载,将王竑给明代宗的两次奏疏情况叙述如下:

第一次奏疏时,王竑官职为金都御史,官阶并不高,为正四品,被朝廷委以重任,让他巡抚淮安、扬州、庐州、凤阳四府及徐州、和州、滁州三州,又命兼理盐课。在此期间,王竑目睹了江淮一带的广大百姓在雨雪等沉重自然灾害打击下,流离失所,生活极为艰难,性命难保的情况,于是在明景泰四年农历正月丁亥日给明代宗上书:

“山东、河南、东昌、开封,抵江北徐淮等处,去年正月大雪异常,夏秋雨水,人民庐舍漂荡,麦稻淹没,老稚颠连流徙。迨者,新春风雨连月,寒沍倍冬,不识天意果何在哉?”

伏望皇上念祖宗社稷之重,上天笞征之戒,责有位之臣,痛自修省改图。进君子而退小人,俾忠良者任政,奸邪者屏处。又必省刑罚而止聚敛,节财用而抑贡赋。罢无益盖造之工,无宁功爵赏之滥,散财以收民心,爱民以植邦本。庶几人事修而天变可回……”^[1]

明代宗采纳了他的这次奏疏意见,当即下诏曰:“连阴雨雪过多,皆朕不德,政务有乖所致,朕深恐惧。内外文武大臣,亦当修省改过。弛辍朕躬,以回天意,以弭灾异。但有可以安邦利民之方,许诸人直言无隐。”^[2]

第二次奏疏时,王竑因担任江淮巡抚功绩卓著,已被朝廷升任为左副都御史,并继续担任江淮巡抚并兼总督漕运,当时江淮一带灾情依然非常严重。王竑于明景泰五年二月丁未日上奏疏道:

“山东、河南并直隶徐淮等处,连年被灾,人民困窘。去岁十一月十六日至今正月,大雪弥漫,平地数尺,朔风峻急,飘瓦摧垣,淮河、东海冰封四十余里。人民头畜冻死不下万计,鬻卖子女莫能尽赅……”

皇上即位以来,敬天之诚,爱民之仁,非不至也,而天变莫测今特尤甚者。臣愚昧无识,切恐圣德虽修而犹未至欤……伏望皇上共责有位之臣,修厥德,新厥治。修德也,必钦天命,法祖宗,正伦理,笃恩义,戒逸乐,绝异端,广仁爱,厚诚信,释猜疑,务果断,则修有其效;图治也,必进忠良,远邪佞,公赏罚,伸冤狱,宽赋役,溥赈恤,节财用,禁聚敛,却贡赋,罢工役,则图治有其实矣……”^[3]

明代宗接到王竑第二次奏疏,同样表示欣然接受。^[4]

为什么王竑第一次上奏疏之后,又第二次上奏疏?原因在于他发现第一次奏疏虽然被明代宗欣然采纳,有所实行,但实行不够彻底,因而实际收效不大;他还发现第一次奏疏中提出的政治主张还不够完善,在第二次奏疏中又做了一些补充。

综合分析王竑这两次奏疏所包含的政治主张,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主要就君主应该加强自身道德修养而说的,其中包括10点内容:

1. 钦天命。(君主应该恭敬天命,不能胡作非为。)
2. 法祖宗。(君主应该效法前代英明君主的做法。)
3. 正伦理。(君主应该端正伦理关系。)
4. 笃恩义。(君主应该注意对人切实实行恩义。)
5. 戒逸乐。(君主不应该贪图安逸享乐。)
6. 绝异端。(君主不应该听信邪说。)
7. 广仁爱。(君主对百姓广泛地实行仁爱。)
8. 厚诚信。(君主对大臣应该诚信。)
9. 释猜疑。(君主对大臣应该消除猜疑。)
10. 务果断。(君主对正确的事情应该果断去做,不能犹豫不决。)

第二方面,主要就革新政治而说的,其中包括13点内容:

1. 进忠良。(君主应该任用忠诚贤能官吏。)
2. 远邪佞。(君主应该疏远奸邪小人。)
3. 公赏罚。(君主应该做到赏罚分明。)
4. 伸冤狱。(君主应该伸张正义平反冤案。)
5. 宽赋役。(君主应该减轻农民租税负担。)
6. 溥赈恤。(君主应该对受灾和困难的百姓广泛地实行救济。)
7. 节财用。(君主应该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8. 禁聚敛。(君主应该禁止聚敛财富。)
9. 却贡赋。(君主应该停止让地方上贡财物。)
10. 罢工役。(君主应该停止建造无益的建筑和让百姓服各种徭役。)
11. 省刑罚。(君主应该减轻刑法。)
12. 散财以收民心。(君主应该散发财宝来收揽民心。)
13. 爱民以植邦本。(君主应该爱护百姓来培植国家根基。)

王竑以上奏疏内容主要针对皇帝说的,但也建议皇帝“共责有位之臣”修明政治,也就是说希望皇帝督促诸位大臣要做到奏疏所讲的这些修明政治的措施。

王竑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些政治主张,并不是偶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他自从走上明朝政坛以来,通过亲自参与有关重大政治活动,深刻了解当时明朝存在的严重政治危机;
2. 他深知解决这些问题,消除明朝政治危机的办法,那就是必须切实进行政治变革来清除各种弊端;
3. 他通过担任两淮巡抚亲自到江淮救灾深入社会下层,目睹了数以万计灾民的深重苦难,因而更加认识到革新政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4. 受到前代著名政治家诸葛亮、魏征等影响。

王竑提出的这些政治措施都是符合当时实际的,皇帝若能认真实行,必然会收到很好的政治效果。实际上王竑的这两次奏疏被明代宗采纳后,得到了一定的实行。《明史·景帝纪》赞曰:“景帝当恫愆之时,奉命摄,旋正大位,以系人心,事之权而得其正者也。笃任贤能,励精政治,强寇深入而宗社又安。再造之绩,良云伟矣!”^[5]应该说这个评价是非常中肯的。明代宗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其中不能不说有王竑的上奏疏之功。换句话说,王竑的政治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明代宗的实行。

王竑的两次奏疏,之所以能够被明代宗采纳,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

1. 王竑奏疏内容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有利于国家和人民;
2. 王竑利用被儒家崇奉的经典著作《易经》和当时被一般人信奉的“天人感应”说来阐明问题,容易被明代宗接受;
3. 王竑当时因为在土木堡事件后,于朝廷当场带头打死锦衣卫指挥马顺和随后的京城保卫战中功勋卓著,在全国享有极高声望,因此深得明代宗信任;
4. 明代宗本身经过土木堡事件和京城保卫战后,受到残酷的现实教育,深知像王振这样的奸佞给国家造成的祸害,也明白只有依靠像王竑这样一些贤能大臣才能治理好国家,因此易于接受这些意见。

但好景不长,随着祸国殃民的明英宗复辟,一大批权奸上台执政,王竑遭到残酷政治迫害,被削职为民送回家乡河州,其政治主张自然也被搁置一边。

在后期,王竑的政治主张主要体现在军事方面。明宪宗即位后,王竑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再次给了王竑实行政治主张的机会。王竑确实在军事方面发挥了卓越才能,向明宪宗提出了一些好建议,并大胆地进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作出了许多贡献:天顺八年冬十月辛巳日,他在升任兵部尚书后,曾给明宪宗上书:“……居安思危,而武事不可不讲。”^[6]

他曾给君主上军事奏疏4份,还具体进行了一些军事革新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恢复武学,为朝廷培养军事人才,加强军事研究;
2. 今天下边疆各陈战守方略,督促各地做好战备工作;
3. 对军队进行整顿,革除影响军队建设的各种恶习弊端;
4. 准备将两位优秀人才岳正和张宁引进到兵部,加强兵部力量。

王竑的这些军事建议切中了当时明朝政治军事的要害,他提出的一些军事改革措施也是非常正确必要的。但不久由于明宪宗听信权臣大学士李贤出于私人成见的意见,阻挠他改革计划的实行,王竑知道自己的政治计划最终难以实现,于是便愤而辞官归隐,其军事改革计划也未能得到贯彻执行。

王竑的辞官归隐既是他个人的政治不幸,也是明王朝的极大政治损失。如果王竑在位的时间更长,他的政治包括军事改革计划得以顺利实现,那么明王朝有可能得到中兴。但由于他的辞官归隐及政治军事改革计划不能实行,导致明王朝一步步走向衰败,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王竑的政治改革主张尽管过去了六百多年,但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他就革新政治而说的许多内容,如“进忠良,远邪佞,公赏罚,宽赋役,节财用,禁聚敛,却贡赋,罢工役,省刑罚,散财以收民心,爱民以植邦本”等,对加强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反对铺张浪费、关注民生等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他提出的有关军事方面的改革主张,对加强军队建设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注释

[1][2][3][4]均引自王沛编著《王竑文化六百年 千古人豪百世圣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第一版。引文分别见该书36页、39页。

[5]引自25史缩印本《明史·景帝纪》[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一版。引文见该书7803页。

[6]引自王沛编著《王竑文化六百年 千古人豪百世圣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第一版。引文见该书44页。

● 周柯